



兒方尊、方彝与穆王前期南土的史与地*

黄锦前

摘要: 兒方尊、方彝应系穆王前期器。铭文记南淮夷侵伐董、庸即庐子国,兒追攻获胜,以所俘获之器作铸彝器以志之。铭文所载穆王前期淮夷作乱应国奉命平叛的史实,可补文献记载之阙,与十月敌簋及应侯视工诸器所记厉王时期淮夷作乱应国奉命平叛之事互为印证,可进一步加深对应国在周代南土地区的地位和作用及穆王时期南土地区形势的认识。过去争议不决的西周金文“蜀”的地望,也可因此而确定在今河南新郑西南。兒的身份,应与敌及格仲相仿,系应国高级贵族。兒方尊、方彝、应鍾方尊、方彝、寿尊及罍簋等器,年代相同,皆为穆王前期,器形、纹饰风格近似,其来源和经历或相同,皆盗掘自平顶山应国墓地,皆系应国重器。

关键词: 兒;蜀;应国;南淮夷;南土

中图分类号: K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669(2025)06-0083-08

香港大唐国际2019秋季拍卖会展示了一组西周兽面纹方彝和方尊^①,方彝长方体,侈口方唇,颈微束,腹外鼓,圈足沿外侈,有阶,盖作四阿屋顶形,上有四阿顶方钮,通体有四道扉棱。盖面和盖钮饰大饕餮纹,圈足饰对首卷鼻夔纹,通体以细密的雷纹填地。尊为天圆地方式,圆广口,粗颈,腹部呈椭圆形,向外微鼓,方形圈足,下有阶,通体有四道扉棱。口沿下饰蕉叶纹,内填倒立卷鼻夔纹,腹饰有首无身减省式大饕餮纹,双兽角向上相对内卷,角上端粗圆下端细锐,似卷云状,圈足饰两两相对卷鼻夔纹,皆以雷纹填地。

拍卖介绍云,与方彝器形、纹饰接近的有山西绛县横水西周晋国墓地 M1006 出土的觀尔方彝、德国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马方彝^②等。与方尊形制近似的有1963年扶风法门镇齐家村西周铜器窖藏出土的日己方尊(《铭图》11777)、

绛县横水墓地 M1006 出土的觀尔方尊(《铭图》11765)、1981年4月7日出现于伦敦富士比拍卖行的鼂方尊^③、日本某收藏家所藏的作厥文祖方尊(《铭图》11793)等。方尊、方彝铜质精良,纹饰绮丽,时代可以确定在西周中期前段,应在穆王世。

此组方尊、方彝器形、纹饰与横水晋国墓地、齐家村西周铜器窖藏等出土和传世者接近,年代也应近同,同样应系穆王前期器。

香港翰海拍卖有限公司2016秋季拍卖会(青铜年代Ⅱ)展出的一组应鍾方尊(《铭三》1006)、方彝(《铭三》1148),器形、纹饰与此组方尊、方彝皆近同。前述山西绛县横水西周晋国墓地 M1006 出土一组觀尔方尊、方彝(M1006:105)及觥(M1006:107)(《铭图》13662),尊、彝器形、纹饰与兒方尊、方彝及应鍾方尊、方彝亦皆近同。

收稿日期:2025-05-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考古学视野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研究”(22VL002)、中国历史研究院“兰台青年学者计划”项目(2022LTQN605)。

作者简介:黄锦前,男,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徐州 221009),主要从事古文字、出土文献、文物考古以及中国古代历史、语言与文明研究。

一、铭文内涵

方彝盖、器内均铸铭文,作:

唯王八月,戎伐菑、膚,及酄、蜀,追攻于蒿,兒用俘器铸旅彝,子子孙孙永用。(《铭三》1150、1151)

“唯王八月”,“王”指穆王。“戎伐菑、膚,及酄、蜀”,“戎”据上下文应指南淮夷,铜器铭文中淮夷又称“淮戎”“戎”,如戎方鼎^④“王用肇使乃子戎率虎臣御淮戎”、晋侯铜人(《铭图》19343)“唯五月,淮夷伐格,晋侯搏戎,获厥君豕师”。

西周早期的铜器有菑伯鼎、菑伯簋,铭文分别作:

菑伯作旅尊彝。(《集成》2155、2156)

菑伯作旅尊彝,八五一。(《集成》10571)

又有菑临鼎、菑临簋,铭文分别作:

菑临作父乙宝尊彝。(《集成》4.2312)

菑临作父乙宝尊彝。(《集成》3647、3648)

可见菑系国族名。西周晚期铜器又有菑生匜(有伯君匜)铭作:

唯有伯君菑生自作匜,其万年子子孙孙用宝用之。(《集成》10262)

“生”应读作“甥”,“菑生”即菑之外甥,其母系菑国族之女。匜曲口阔流,后有龙形鋈,龙口衔沿,下有四夔龙扁足。口沿饰变形兽体纹,腹饰瓦纹,系南土汉淮一带常见的风格。铭文字体亦系汉淮一带的风格特征,因此菑应在南土汉淮流域一带。

商代晚期的小子觚卣铭曰:

乙巳,子命小子觚先以人于菑,子光赏觚贝二朋,子曰:贝唯丁,蔑汝历。用作母辛彝,在十月,月唯,子曰:命望人(夷)方罍。(盖铭)(《集成》5417;《铭图》13326)


“菑”显系地名,据卣铭,应与人(夷)方相距不远。结合上揭菑伯、菑临诸器及菑生匜,尊及方彝的“菑”系国族名兼地名,在南土汉淮流域一带。

史密簋“故南夷膚、虎,会杞夷、舟夷、藿不折,广伐东国齐师、族土、遂人,乃执鄙寡亚”

(《铭图》05327),“虎”即虎方,“膚”为南夷方国名,李学勤云即古庐子国,在今安徽庐江西南^⑤。《汉书·地理志》“庐江郡”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故庐子国。”^[1]《通典》州郡十一古扬州庐江郡“庐州”云:“古庐子国也,春秋舒国之地。”^[2]古文字中“膚”(帮母鱼部)与“卢”(来母鱼部)音近可通^⑥。

九年卫鼎“唯九年正月既死魄庚辰,王在周驹宫,格庙,眉敖者膚卓吏视于王,王大觐”(《集成》2831),眉敖使者觐见王,亦应系履行纳帛等封建义务。“膚”或与史密簋“故南夷膚、虎”的“膚”同,即庐方、古庐子国,系南夷之一。

伯戾父簋“唯王九月初吉庚午,王出自成周,南征,伐服、孳、英、桐、潘”(《铭图》05276、05277),猷钟(宗周钟)“王肇遘省文武勤疆土,南国服、孳,敢陷处我土,王敦伐其至,翦伐厥都,服、孳乃遣闲来逆昭王,南夷、东夷俱视,廿又六邦”(《集成》260),“服”为南土小国。

过去徐中舒云“戾、濮古同在帮并母,疑戾子即《牧誓》微、卢、彭、濮人之濮”^[3],杨树达亦云“以音求之,戾盖经传之濮也”,即《左传·昭公九年》“巴、濮、楚、邓,吾南土也”之“濮”,亦称“百濮”^⑦。笔者曾引徐、杨二氏之说并加以肯定^⑧,实误。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出土一件濮监簋(M107:2)^⑨,“濮”字作,与“戾”判然有别。“服”古音为并母职部,与“膚”“卢”皆近,结合铭文所涉有关地理来看,“服”应读作“膚”或“庐”,即庐子国。

“及酄、蜀”,“酄”“蜀”据上下文可知应皆系地名。鄂君启车节“自鄂市,就阳丘,就方城,就兔禾,就栖(柳)焚(焚),就郢阳,就高丘,就下蔡,就居巢,就郢”(《集成》12110、12111、12112),《左传·宣公九年》:“楚子为厉之役故,伐郑。晋郤缺救郑。郑伯败楚师于柳焚。”杜预注:“柳焚,郑地。”^[4]⁴⁰⁷⁰“酄”与“柳焚”的关系待考。1972年,安徽阜阳颍上县赵集出土一件商代晚期的爵^⑩,盩内腹壁有铭文“酉”字,应系徽记符号,这种徽记符号一般标示族氏(国族),往往也兼为地名。周人伐南淮夷,今安徽阜阳颍上一带处于南淮夷和应国之间,是伐南淮夷的必经之地,“酄”与“酉”或不无关联,详细情况待考。

“蜀”见于班簋铭,作:

唯八月初吉，在宗周，甲戌，王命毛伯更號城公服，屏王位，作四方极，秉鯀、蜀、巢，命锡铃、勒，咸。王命毛公以邦冢君、徒馭、或人伐东国瘠戎。王命吴伯曰：以乃师左比毛父。王命吕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遣命曰：以乃族从父征，诞城卫父身。三年靖东国，亡不成眈天畏，否畀纯陟。（《集成》4341）

“秉鯀、蜀、巢”，“鯀”见于2003年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祝家巷发现的周初背甲C10④4:2刻辞“唯五月哉死霸壬午，翦繁”^⑩，“翦繁”亦即伐繁。又鞆鬲^⑪、鞆壶^⑫“唯正月既死霸庚申，王在宗周，王朝命鞆使于鯀（繁）”，“鯀”即“繁”，亦即《左传》的繁阳，曾伯霽簠（《集成》4631、4632）、曾伯霽壶^⑬、鄂君启车节、晋姜鼎（《集成》2826、《铭图》02491）、戎生编钟^⑭及繁阳之金剑（《集成》11582）等的“繁汤”“繁阳”，在今河南新蔡县东北。“巢”即陕西岐山凤雏出土卜甲H11:110“征巢”^⑮、长安张家坡墓地所出蔡侯鼎“蔡侯获巢，掎厥金冑”（《集成》2457）等的“巢”，《尚书·旅巢命》序“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⑯，其地在今安徽巢湖东。“蜀”，学者或以为在山东，即《春秋·成公二年》“十有一月，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⑰及《国语·楚语》“（楚灵王）而后使太宰启疆请于鲁侯，惧之以蜀之役”^⑱的鲁地蜀（《左传·宣公十八年》：“楚庄王卒，楚师不出。既而用晋师，楚于是乎有蜀之役。”杜预注：“蜀，鲁地，泰山博县西北有蜀亭。”^⑲）；或以为在今河南禹州市东北、新郑市西南^⑳，即《竹书纪年》“（夷王）二年，蜀人、吕人来献琮玉，宾于河，用介珪”^㉑之蜀，《庄子·外物》：“苕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化而为碧。”^㉒“蜀”亦即此。李学勤则认为系今四川成都盆地的蜀，位于巴国之西^㉓。今据兒诸器铭文，蜀的地望显然应以在今河南新郑附近说为是。

1977年陕西岐山凤雏出土的西周早期卜甲H11:68“伐蜀”、H11:97“克蜀”^㉔，李学勤云两者的“蜀”字写法和班簠一样，卜辞的“伐蜀”“克蜀”有可能同《世俘》所记武王伐纣后命新荒伐蜀是同一件事情，揣想纣死后，商臣霍侯等逃亡入蜀，武王遣军追击，将霍侯等擒获^㉕。李学勤云两者的“蜀”字写法和班簠一样，意即“蜀”所

指相同，可信。但是凤雏卜甲的年代，或早不到周初^㉖，卜辞的“伐蜀”“克蜀”同《世俘》所记武王伐纣后命新荒伐蜀因而也就不大可能是同一件事。《逸周书·世俘》所载“新荒伐蜀”事，蒙文通指出：

蜀在梁州，梁州以外还别有个蜀。《逸周书·世俘》说：“庚子……新荒命伐蜀；乙巳，新荒蜀磨至，告禽。”从庚子到乙巳，不过五天，往伐蜀的将领就回来了。这显然不是梁州蜀，而是距离牧野不远的蜀；也就不是从武王伐纣的蜀，而是与纣同党的蜀。这必然别是一个蜀。决无刚刚败殷于牧野的几天之后，就来伐自己伙伴的道理。^㉗

其说是。林向亦云：“庚子伐蜀，乙巳自蜀至，前后才6天，这个蜀只能是在牧野附近，绝不可能远征成都平原的。”^㉘王先胜认为，“新荒伐蜀”之“蜀”很可能即新郑附近之蜀^㉙。陈梦家云蜀不知所在，《竹书纪年》“夷王二年，蜀人、吕人来献琮玉，宾于河，用介珪”，或即此蜀^㉚。白川静云，如果认为吕是申吕之吕的话，蜀也应是其邻接之地。在卜辞中所见的蜀跟缶并称例颇多，有卜殷王对缶的亲征之例，在殷王的行动圈之内，似乎是河南西部的古族^㉛。此说可信。

根据上文的分析，蜀应在今河南禹州与新郑之间，与位于今河南平顶山一带的应国邻近，故淮夷内侵及蜀，应国奉命追拦，与当时的历史地理形势也相吻合。据上下文，酈应在蜀及南淮夷之间，由此观之，上述酈的地望，应以在今安徽颍上一带的可能性较大，具体待考。

《左传·庄公十四年》：“郑厉公自栎侵郑，及大陵，获傅瑕。”^㉜又《庄公十六年》：“秋，楚伐郑，及栎。”^㉝二者皆与方彝铭“戎伐菑、酈，及酈、蜀”文例相近。

“追攻于蒿”，“蒿”据上下文和有关文例看应系地名，类似文例在铜器铭文中屡见，如：

（1）十月敌簠：唯王十月，王在成周，南淮夷適、爰内伐涇、昴、参原、裕敏、阴阳洛，王命敌追拦于上洛、燧谷，至于伊班、长榜，捷首百，执讯卅，夺俘人四百，献^㉞于荣伯之所，于燧衣諱，复付厥君。（《集成》4323、《铭图》05380）

（2）不嬰簠：唯九月初吉戊申，伯氏曰：

不嬰,馭方、獬狁广伐西俞,王命我羞追于西……余命汝御追于罍。(《集成》4328、4329)

(3)多友鼎:唯十月,用獬狁方兴,广伐京师,告追于王,王命武公:“遣乃元士,羞追于京师。”武公命多友率公车羞追于京师。癸未,戎伐笋,卒俘,多友西追……追搏于世,多友又左折首执讯,乃𡔷追,至于杨冢。(《集成》2835)

(4)卅二年逯鼎:戎狁出,捷于井阿,于历岩,汝不歆戎,汝光长父以追博戎,乃即宕伐于弓谷,汝执讯获馘,俘器车马。^⑤

(5)或簋:唯六月初吉乙酉,在堂师,戎伐𡔷,或率有司、师氏奔追袭戎于械林,搏戎胡。朕文母竞敏寗行,休宕厥心,永袭厥身,俾克厥敌,获馘百,执讯二夫,俘戎兵:盾、矛、戈、弓、簠、矢、褱、胃,凡百有卅又有五款,将戎俘人百有十有四人。卒搏,无戮于或身,乃子或拜稽首,对扬文母福烈,用作文母日庚宝尊簋,俾乃子或万年,用夙夜尊享孝于厥文母,其子子子孙孙永宝。(《集成》4322)

又《左传·庄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济西”^{[4]3847},亦可证。“蒿”应读作“郊”,应指上文“蜀”之郊外。《左传·桓公十四年》“冬,宋人以诸侯伐郑……入,及大逵。伐东郊,取牛首”^{[4]3815}可以作证。

“攻”,原作“工”。《战国策·西周策》:“败韩魏……取蔺、离石、祁者,皆白起。是攻用兵。”高诱注:“攻,巧玄也。”吴师道补正:“‘攻’‘工’字通借。”^[13]“攻”者,伐也。子犯编钟“唯王五月初吉丁未……诸楚荆不听命于王所,子犯及晋公率西之六师搏伐楚荆,孔休,大攻楚荆,丧厥师,灭厥孤”^⑥,吴王姑雎𡔷𡔷剑(吴王余昧剑、寿梦之子剑)“攻敌王姑发难,寿梦之子,𡔷𡔷郟之义弟,初命伐麻,有获。荆伐徐,余亲逆袭之,败三军,获[车]马,支七邦君”^⑦,逯鼎“王命遣捷东反夷,逯肇从遣征,攻踰无敌,省于人身”(《集成》2731)。

“兒用俘器铸旅彝”,“兒”系作器者和器主。金文中类似文例很多,如:

(1)过伯簋:过伯从王伐反荆,俘金,用作宗室宝尊彝。(《集成》3907)

(2)逯鼎:王命遣捷东反夷,逯肇从遣征,攻踰无敌,省于人身,俘戈,用作宝尊彝。(《集成》2731)

(3)引簋:唯正月壬申,王格于冀大室。王若曰:“引,余既命汝更乃祖总司齐师,余唯申命汝,锡汝彤弓一、彤矢百、马四匹,敬乃御,毋败绩。”引拜稽手,对扬王休,同随追,俘吕兵,用作幽公宝簋。(《铭图》05299、05300)^⑧

二、史料系联

上揭十月敌簋铭全文作:

唯王十月,王在成周,南淮夷遁、爰内伐洹、昴、参原、裕敏、阴阳洛,王命敌追拦于上洛、熨谷,至于伊班、长榜,捷首百,执讯卅,夺俘人四百,献于荣伯之所,于熨衣諱,复付厥君。唯王十又一月,王格于成周太庙,武公入佑敌,告擒馘百、讯卅。王蔑敌历,使尹氏授赉敌圭瓚、𡔷贝五十朋,锡田于斂五十田,于早五十田,敌敢对扬天子休,用作尊簋,敌其万年子子子孙孙永宝用。(《集成》4323、《铭图》05380)

簋铭记厉王时淮夷伐内侵敌奉命追拦之事,与兒方尊、方彝铭文语境及措辞均接近。

类似者还有近年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的格仲鼎(M2002:9)^⑨、簋(M2002:8、33)^⑩,铭作:

唯正月甲午,戎捷于丧(桑)遘(原),格(霸)仲率追,获讯二夫,馘二,对扬祖考(考)福,用作宝鼎/簋。

“格”即“霸”,是与晋相邻的小国,据大河口墓地的发掘,其地应在今山西翼城县一带^⑪。“丧(桑)遘(原)”与敌簋的“参原”为一地,推测应在霸国境内,或与霸国邻近^⑫。格仲鼎、簋所记内容与语境亦与兒方彝及十月敌簋近同,另不嬰簋“馭方、獬狁广伐西俞,王命我羞追于西”,记事内容与语境亦近,皆可以帮助理解兒方彝铭文。

又霸伯盘(M1017:41)、晋侯铜人铭曰:

唯正月既死霸丙午,戎大捷于霸,霸伯搏戎,获讯一夫,霸伯对扬,用作宜姬宝盘,孙孙子子其万年永宝用^⑬。

唯五月,淮夷伐格,晋侯搏戎,获厥君

豕师，侯扬王于兹。(《铭图》19343)

盘铭记穆王前期驭戎南侵，至于霸，霸伯搏戎。铜人铭记厉王时淮夷侵犯格国，晋侯率军搏戎，并擒获其君长。盘及铜人铭文记事也皆与上述诸器相近，铜人铭与应侯视工鼎“用南夷逆敢作非良，广伐南国，王命应侯视工曰：征伐逆。我禹命翦伐南夷逆，我多俘戈^⑧，余用作朕烈考武侯尊鼎”^⑨及应侯视工簋(Ⅱ)“唯正月初吉丁亥，王若曰：应侯视工，哉淮南夷逆敢搏厥众鲁，敢加兴作戎，广伐南国。王命应侯征伐淮南夷逆，休克，翦伐南夷，我俘戈”^⑩所记皆系厉王时和淮夷战争的史事。另上揭戠簋、多友鼎、卅二年迷鼎等有关战争的记载，也多可与尊、彝铭文相互发明，加深对其记事背景的认识。

对照晋侯铜人、十月敌簋与应侯视工诸器及格仲鼎、簋与霸伯盘等，其铭文反映的是穆王前期淮夷作乱，应国奉命平叛的史实，可补文献记载之阙。

周初为巩固统治，周王大规模分封宗室，作为王朝的屏藩。西周早期的淮域与江汉地区，主要有应、曾、鄂、楚、邓、郢、蔡等封国，其中应、曾、蔡是姬周同姓封国。周文王子南宫，在周初被成王册命为曾侯，在今随州一带立国，作为江汉地区战略防御的核心，与在今河南平顶山的应国和上蔡的蔡国，形成犄角之势，共同构成了周王朝在江汉、淮域战略防御体系的核心，牵制江汉流域的鄂、楚、邓等异姓诸侯，同时与应、蔡一起，镇守淮域的淮夷诸邦，作为南土的屏障。《国语·郑语》载史伯云：“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6]461}

封曾于江汉，是为了牵制淮域及江汉的异姓诸侯。曾侯與编钟“王逝命南公，营宅汭土，君庇淮夷，临有江夏”^[14]，实即言其对荆蛮及南淮夷的震慑牵制作用。位于今随州的曾国，是江汉地区战略防御的核心，也是整个南土战略防御体系的核心，地位与齐、鲁、燕、卫等诸侯相当，是周代南土的方伯。位于今河南上蔡一带的蔡国，是周王朝对南淮夷的前哨和桥头堡，担负着直接监视和牵制南淮夷诸邦的使命。

十月敌簋记王命敌追拦南淮夷于上洛等地、应侯视工鼎及簋记厉王时敌与应侯视工奉命追拦、征伐南淮夷事，皆表明应国对抵御南淮

夷、屏藩周室所起的重要作用。南淮夷内侵，作为桥头堡和第一道防线的蔡国首当其冲，其次是位于其后方的应国。蔡国抵挡不住，第一道防线失守，淮夷入侵至沔、昝、参原、裕敏、阴阳洛等周人统治的核心地带，即应国及成周附近，因而王命敌追拦于上洛等地，命应侯视工伐南淮夷。由此可见，周王朝在南土淮域及江汉地区的管理模式是：曾作为南土的方伯，系诸侯之长，应国和蔡国处于辅助地位，牵制鄂、楚、邓、郢等异姓诸侯及南淮夷诸邦。

总之，兒方尊、方彝所记穆王前期南淮夷内侵之事，与十月敌簋及应侯视工诸器所记厉王时期淮夷作乱应国奉命平叛之事可互为印证，可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应国在周代南土地的地位和作用及穆王时期南土地形势的认识。兒的身份，应与敌及格仲相仿。格仲系霸伯尚之弟^⑪。十月敌簋的敌与1986年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的公作敌鼎(M95:102)(《铭图》02301、02302)、公作敌簋(M95:100)(《铭图》05072、05073)的敌为同一人，系应侯视工之弟^⑫。

三、追根溯源

上揭与兒方尊、方彝形制、纹饰均近同的应鍾方尊、方彝，据介绍亦系香港藏家旧藏，曾先后于2000年、2008年在台北和纽约苏富比春季拍卖行展出^⑬。方尊与方彝为同组器，纹饰风格、铭文完全相同。盖内壁与器内底铸有对铭：

应鍾作宗宝尊彝。

“应鍾”应系应国贵族名鍾者。结合上述兒方尊、方彝的器形、纹饰及铭文内容，兒方尊、方彝与应鍾方尊、方彝的来源可能相同，即盗掘自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其流传经历也大致相同。

上揭山西绛县横水墓地出土的觀尔方尊、方彝及觥，铭文分别作：

(1)觀尔方尊：觀尔作父丁宝尊彝，孙孙子其永宝，钺。(《铭图》11765)

(2)觀尔方彝：觀尔作父丁宝尊彝，孙孙子其永宝，钺。(《铭图》11535)

(3)觀尔觥：觀尔作父丁宝尊彝，孙孙子其永宝，钺。(《铭图》13662)

觀尔方尊形制与矢令方尊^⑭接近，方彝

(M1006:105)形制纹饰与1963年陕西扶风齐家村西周铜器窖藏出土的日己方彝^①和矢令方彝^②等接近。觥盖为一卷角兽,阔口獠牙,巨角小耳,圆目鼓睛,后端作竖耳兽面,盖脊两侧饰回首虎耳卷尾夔龙。觥体前部有流,纹饰和觥盖相同,长方体,腹微外鼓,四角有扉棱,腹饰上卷角兽面纹,卷角之间填一对小龙,圈足亦有扉棱,饰变形象鼻夔龙纹。其形制纹饰与扶风齐家村西周铜器窖藏出土的日己觥^③接近。该组器的年代应为西周早期后段,为昭王前后器。方尊、方彝及觥铭文皆同,“钺”系徽记符号。此组器的年代明显早于墓葬年代,据铭文内容和徽记符号看,可能非匭国之器,或系罍器。值得注意的是,该组器系考古发掘出土,其组合中有觥,另上揭1963年扶风法门镇齐家村窖藏出土的日己方尊、方彝及觥诸器中也有觥,这就自然会使我们推想,兕组器与应鍾组器,其原来完整组合也可能有觥。

这里还应提到一件经历相似的应国重器寿罍尊。香港翰海拍卖有限公司2017年秋季拍卖会(青铜年代Ⅲ)中有一件香港私人收藏的寿罍尊^④,喇叭口,束颈,下腹略向下倾垂,矮圈足,有阶。口沿下饰一周蕉叶纹,内填变形龙纹(饕餮纹),颈饰长卷尾鸟纹,前后增饰浮雕兽首,腹饰分解式大龙纹(饕餮纹),皆以云雷纹填地,造型极精美。其形制及颈部所饰长卷尾鸟纹皆与1992年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的罍尊(M84:99)^⑤近同。年代为西周中期穆王前期器。

尊内底所铸铭文作:

唯九月初吉己亥,寿罍蔑历于侯氏,锡
 驻马卅匹,寿罍扬对侯休,用作乙侯宝宗彝,
 子子孙孙其万年宝用。

“寿罍蔑历于侯氏”的“侯氏”及“寿罍扬对侯休”的“侯”应为同一人,系穆王前期的应侯;受赐者寿罍与其系同宗兄弟;“乙侯”系寿罍及“侯氏”或“侯”的共同祖考。铭文记寿罍为其兄侯氏所嘉勉和赏赐,因而作器答谢其兄长侯氏,以纪念并祭祀其共同的祖考乙侯。此尊为应国铜器^⑥。

《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甲骨文金文集粹》公布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近年入藏的一件罍簋^⑦,侈口,深腹,底近平,腹壁斜收,近底处内折,高圈足外撇,下有阶,兽首耳下以兽尾为垂珥。口沿

下饰一周顾首卷尾龙纹。形制与中簋(中作从彝簋)^⑧、歃簋^⑨等接近,纹饰与戠簋^⑩、鬲伯簋(《铭图》04184)接近,唯颈部无浮雕兽头,属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中簋的I型3式^⑪,年代为西周中期前段,为穆王时器。

簋内底铸铭文作:

唯九月初吉庚午,应侯命罍曰:“司朕走马、驭。”罍敢对扬皇君颀命,用作朕刺考
 黜彝,罍其万年永宝用。

作器者“罍”与1992年平顶山应国墓地M84出土的“作罍宫彝”铭盘、盃(M84:28、50)的“罍”应为同一人;据年代及器物共出等情况,罍簋的“应侯”,可能即应国墓地M84的墓主应侯禹,罍的主要生活年代,应与其大致相当,为西周中期前段。

上述于近年陆续披露的四组器物年代相同,皆为穆王前期,器形、纹饰风格近似,其来源和经历或相同,皆盗掘自平顶山应国墓地。

结 语

综上,兕方尊、方彝应系穆王前期器。铭文记南淮夷侵伐菑、庸即庐子国,兕追攻获胜,以所俘获之器作铸彝器以志之;与十月敌簋、格仲鼎、簋、霸伯盘、应侯视工诸器及晋侯铜人等铭文记事近似,语境及措辞接近。对照可知,铭文反映的是穆王前期淮夷作乱应国奉命平叛的史实,可补文献记载之阙,与十月敌簋及应侯视工诸器所记厉王时期淮夷作乱应国奉命平叛之事互为印证,可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应国在周代南土地地区的地位和作用及穆王时期南土地地区形势的认识。过去争议不决的西周金文中“蜀”的地望,也可因此而确定在今河南新郑西南。兕的身份,应与敌及格仲相仿,系应国高级贵族。兕方尊、方彝、应鍾方尊、方彝、寿罍尊及罍簋等器,年代相同,皆为穆王前期,器形、纹饰风格近似,其来源和经历或相同,皆盗掘自平顶山应国墓地,皆系应国重器。

注释

①香港大唐国际2019年秋季拍卖会I青铜器预览(二),
<https://mp.weixin.qq.com/s/bhFEo6V8D0m4jmrqcqv58g>;吴镇

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以下简称“《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1017,第3卷,第80—81页;1150、1151,第3卷,第260—263页。②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以下简称《铭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13535、13538,第24卷,第410、415页。③刘雨、汪涛:《流散欧美殷周有铭青铜器集录》,164,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简称《集成》),中华书局1984年—1994年版,5.2824。⑤李学勤:《史密簋铭所记西周重要史实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年第2期。⑥参见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8、99页。⑦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17、118页,“宗周钟跋”。⑧⑩黄锦前:《叶家山M107所出濮监簋及相关问题》,《四川文物》2017年第2期。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107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6年第3期,第15、16页,图版八一—一〇。⑪李伯谦主编:《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第8卷,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页。⑫周原考古队:《2003年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调查报告》,载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79页,图二五;董珊:《试论周公庙龟甲卜辞及其相关问题》,载《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245页。⑬孙庆伟:《从新出鞬卣看昭王南征与晋侯燹父》,《文物》2007年第1期,第64—68页,封二,第65页图二。⑭曹锦炎:《新见鞬卣铭文及其相关问题》,载《李学勤先生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西书局2019年版,第217—225页。⑮方勤等:《湖北京山苏家垄遗址考古收获》,《江汉考古》2017年第6期,第9页,图版七、图三。⑯《保利藏金》编辑委员会:《保利藏金——保利艺术博物馆精品选》,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128页。⑰⑳曹玮:《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77页,第52、71页。㉑参看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㉒⑳李学勤:《论繁蜀巢与西周早期的南方经营》,载《三星堆文明》第二辑,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㉓王力之:《早期楚文化探索》,《江汉考古》2003年第3期。㉔[日]白川静:《金文通释》,载《白川静著作集别卷》,(日本东京)平凡社2004年版,第42页。㉕据上下文及有关文例,此字应系“献”字误摹,庚壶(《集成》15.9733)“执者献于灵公之所……归献于灵公之所……献之于庄公之所”、多友鼎“多友乃献俘、献、讯于公,武公乃献于王”、虢季子白盘(《集成》16.10173)“献馘于王”及不婴簋(《集成》4328、4329)“余来归献擒”等,均可证。旧多释作“𩇑”,不确。陈梦家释作“𩇑”,近是,参见陈梦家:《西周铜器

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30页。㉖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眉县文化馆:《吉金铸华章——宝鸡眉县杨家村单氏青铜器窖藏》,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39、47页。㉗张光远:《故宫新藏春秋晋文称霸“子犯和钟”初释》,《故宫文物月刊》1995年第4期,第4—31页;又《子犯和钟的排次及补释》,《故宫文物月刊》1995年第9期,第118—123页;又《春秋中期晋国子犯和钟的新证、测音与校释》,《故宫文物月刊》2000年第5期,第48—67页。㉘曹锦炎:《吴王寿梦之子剑铭文考释》,《文物》2005年第2期,第67—74页,第68页图一。㉙释文参考李学勤:《高青陈庄引簋及其历史背景》,《文史哲》2011年第3期;后辑入氏著《三代文明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13—117页。㉚㉛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翼城县文物旅游局联合考古队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2002号墓发掘》,《考古学报》2018年第2期,第223—262页,图版肆,第230页图六:1,图版玖,图版拾壹:1,图版拾,第234页图一一,第235页图一二。㉜黄锦前:《说西周金文中的“霸”与“格”——兼论两周时期霸国的地望》,《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5期。㉝㉞黄锦前:《翼城大河口M2002出土铜器铭文读释》,《北方文物》2022年第3期。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1017号墓发掘》,《考古学报》2018年第1期,图版叁拾贰,第125页图三八:3。㊱“戈”从谢明文释,参见谢明文:《攻研杂志(四)——读“首阳吉金”札记之一》,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08年10月23日, 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530。㊲李朝远:《雁侯见工鼎》,载《上海博物馆集刊》第10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113页;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西周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三六三,第413—415页。㊳首阳斋、上海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首阳吉金——胡盈莹、范季融藏中国古代青铜器》,3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114页。㊴过去一般将公作敌鼎、敌簋的年代定为西周中期,不确。此前王龙正也曾推测十月敌簋与公作敌鼎及敌簋的敌系同一人,参见王龙正:《平顶山应国墓地九十五号墓年代、墓主及相关问题》,《华夏考古》1995年第4期。㊵清玩雅集千禧年藏品展,111、112,台湾台北,2000;Fine Chinese Ceramics & Works of Art #70、71, Sotheby's, New York, 18, March, 2008 (2008年3月18日,纽约苏富比春季拍卖,“中国瓷器与工艺品”,#70、#71)。㊶陈芳妹:《商周青铜酒器》,36,台北故宫博物院1989年。㊷㊸㊹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第5卷,一三五,一三一,一〇七,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㊺雅昌艺术网,香港翰海拍卖有限公司·2017秋季拍卖会·青铜年代Ⅲ,0109西周中期寿罍尊, <http://auction.arttron.com>

net/paimai-art5112330109/。④⑤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平顶山应国墓地I》,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彩版七九:4,第580页,第582页图二六八,彩版七六:4、5、6。④⑥黄锦前:《寿尊考释》,载《古文字研究》第33辑,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306—310页。④⑦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甲骨文金文集粹》,54,安徽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216—219页。④⑧林巳奈夫:《殷周时代青铜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一》,图版,小型孟90,吉川弘文馆1984年版,第146页。④⑨René-yvon Lefebvre d'Argencé, *Bronze Vessels of Ancient China in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p. 79, San Francisco: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1977; 林巳奈夫:《殷周时代青铜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一》,图版,小型孟89,第146页;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西周篇),三二一,第302页。④⑩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西周篇),三一—,第271页。④⑪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58—67页。

参考文献

-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569.
[2]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4809.
[3]徐中舒.殷周之际事迹之检讨[M]//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652-691.

- [4]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9:414.
[6]徐元诰.国语集解[M].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
[7]郝懿行.竹书纪年校证[M].济南:齐鲁书社,2010:3895.
[8]王先谦.庄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7:237.
[9]蒙文通.古族甄微[M]//蒙文通全集:四.成都:巴蜀书社,2015:124.
[10]林向.殷墟卜辞中的“蜀”:三星堆遗址与殷商的西土[M]//巴蜀考古论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37.
[11]王先胜.评《走出疑古时代》[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2):129-146.
[12]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M].北京:中华书局,2004:26.
[13]战国策[M].刘向,集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56.
[1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文峰塔M1(曾侯與墓)、M2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14(4):50.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e Southern Territories in the Early King Mu Period: A Study Based on the Er Fangzun and Fangyi Vessels

Huang Jinqian

Abstract: The Er Fangyi (a rectangular wine vessel) and Fangzun (a square wine vessel) should date back to the early reign of King Mu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inscriptions record the Southern Huaiyi's (a group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Huai River basin) invading and attacking Jin and Fu, which refer to the State of Luzi. The Er State pursued and defeated the Southern Huaiyi, subsequently casting these ritual bronze vessels and using the inscriptions to commemorate this victory. The historical fact recorded in the inscriptions—namely, the State of Ying's commission to suppress the rebellion of the Huaiyi in the early reign of King Mu—can fill the gaps in textual records. It also corroborates the records on the Huaiyi rebellion and the State of Ying's mission to suppress it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Li, as seen in the Shiyueqigui (the Gui vessel inscribed with “Shiyue”) and the vessels associated with Marquis of Ying named Shigong. This enha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tus and political role of the State of Ying in the Southern Territory—a region in southern Zhou territory—during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s well as the situation in the Southern Territory in the early reign of King Mu. Additionally, the long-debated location of “Shu” mentioned in We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s can be confirmed as southwest of present-day Xinzheng, Henan Province. The identity of Er should be similar to that of Yu and Gezhong, being a senior aristocrat of the State of Ying. Er Fangzun, Fangyi, Yingmin Fangzun, Fangyi, Shoumei zun and Chugui (a round-mouthed ritual vessel) all date back to the early reign of King Mu. They share the same vessel shape and decorative style, and probably the same origin and history: all were illicitly excavated from the Ying State cemetery in Pingdingshan, and are important vessels of the State of Ying state.

Key Words: Er; Shu; state of Ying; southern Huaiyi; southern territory

[责任编辑/启 轩]